

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

费孝通

张江华 沈关宝 等 著

深入与反思

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与30年来的
中国城镇化实践

Intensive Study and Reflection:

Hsiao-Tung Fei's Small-Town

Theory and 30-years

Urbanization Practice in China

F-299.2
262

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

费孝通

张江华 沈关宝 等 著

深入与反思

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与30年来的
中国城镇化实践

Intensive Study and Reflection:
Hsiao-Tung Fei's Small-Town
Theory and 30-years
Urbanization Practice in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入与反思: 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与 30 年来的中国城镇化实践/张江华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

ISBN 978 - 7 - 5097 - 8369 - 6

I. ①深… II. ①张… III. ①费孝通(1910 ~2005) - 小城镇 - 发展理论 - 理论研究②城市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8855 号

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

深入与反思

——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与 30 年来的中国城镇化实践

著 者 / 张江华 沈关宝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颜青琪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010)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369 - 6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纪念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 80 周年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大学“十二五”内涵建设项目
“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资助

序

张江华*

1983年9月21日，费孝通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做了一个长篇演讲，对吴江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做了仔细的分析。这个演讲后来以《小城镇 大问题》为题公开发表，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经典文献。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城市化的实践过程，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镇化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此时此刻，重温费孝通的这篇著名论文我们发现，中国新时期的城镇化与费孝通的理论创见经历了交涉、分野、回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有创造力的理论所具有的生命力。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尚未放开，但农村工业化的活力已经开始显现，尤其是苏南一带。这一时期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既唤醒了费孝通早年对乡村工业化的记忆，也激起了他对新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期待。他敏锐地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小城镇在人口集聚与转移及技术、资本衔接与转换上的重要性。立足于中国自身的资本与技术及积极而稳妥发展的思路，费孝通提出了小城镇在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这一基于现实发展出来的理论观点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内向型”或“内发型”的发展道路。

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实际上走上了“外向型”发展道路。这种外向型经济是引进外资、技术与原材料，经加工后再出口，利用中国便宜的人力资源迅速发展经济。在此之前，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在中国各地寻找“因地制宜，多样模式”，即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所说的内发型经济。直到80年代末，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

* 张江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业的兴起让费老看到了一种新模式。费老敏锐地注意到这是一种与中国内地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他称这种模式“随时应变，不失时机”。虽然费老意识到这类由香港所带动、辐射的经济模式的重要性，但最初在他眼里，也仅限于地区。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通过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在国内尤其是东部地区营造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与技术，进而加工出口，中国成功地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经济也因此实现了腾飞，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在空间上扩大了3倍，城镇化率增长到52.5%，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中国已由传统的农业国迈向工业化国家。

在城市化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导致的后果是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外向型经济通常由国家与地方政府主导，工业区也因此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因此通常在首都或地区首府所在地附近，如此便导致人口向首都与大城市集中。在国际上，像泰国、韩国都出现了因为采用外向型经济政策而促使人口向首都集中的现象。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同样出现了与泰国、韩国一样的问题，城市化发展存在两方面的不平衡。一方面，城市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即人口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在各地区则是省会等中心城市。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越大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与现代化的水平也越高，因此，各类资源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以教育为例，改革开放初期，集中在中心城市的更多的是高等学府，但在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学、小学乃至学前教育的资源也都流向大城市。现在各地最好的中学均在省会城市，一些超级中学也开始出现，很多地方上有条件的家长也开始越过地方，将孩子送到中心城市接受中学、小学教育；而一些地方传统名校，则因为师资不足与本地优秀生源的流失而渐趋衰落。另一方面，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东部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还是人口密度、就业机会，以及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都远高于西部地区。事实上，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甚至部分乡村地区已超过城市；而西部则集中了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虽然30多年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较之东部而言，差距仍然很大。

这类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本土农民被城市化过程排斥。外向型经济是由政府与外来资本主导的经济，这一经济主导下的城市扩张过程实际上是将本土农民边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本土农民不仅会失去土地，也无法进入和融入在其原有土地上新建的企业，保留的“城中村”也会成为城市内社会问题集中的区域。在征地补偿力度较大的地方，原有的社区通常会因内部分配问题而频起纠纷；而征地补偿力度较小的地方则不断出现抗拒拆迁事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农民虽然在身份上已经成为城市的市民，但在人口素质上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变。

在中国，这一过程中还存在所谓的人户分离问题。这部分人口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虽然拥有城市户籍但户籍并不在所生活与工作地区的人口；另一部分是总数约 2.6 亿的农民工，他们的户籍在农村，但生活与工作在城市，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也在城市，他们在统计上已开始被计入城市人口，但实际在身份上仍被排斥在所在城市之外。由于大中城市有更多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因而这两类人群都集中于此，前者是所谓的“蚁族”，后者则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然而户籍政策与大城市过高的房价阻碍了他们实际融入所在的城市，也就是说，大城市虽然吸引了这些外来人口，却又并没有能力将他们完全消化掉。尤其是农民工，他们为外向型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劳力，但他们的所得却并不能保障基本的生活，他们自己和子女也很难完整享受该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显然，这类身份上的不平等不仅对他们本身不公平，也会在他们的下一代中持续再生产，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如果国家取消户籍制度，就会面临大城市更严重的人口拥挤问题。因此，他们是最终融入城市还是回流到原居地？回到原居地的话，是回到农村还是附近的城镇？这些问题仍然是中国城市化过程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自然而然的选择。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大城市与中心城市得到一定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人口也渐趋饱和，甚至一些大城市已经到了发展的极限，城镇化因此成为国家疏导大城市无法吸纳的人口以及进一步吸纳乡村人口的过程。这一点也可从最近几年乡镇的迅速发展中看出端倪。事实上，由于大城市的户籍障碍和过高的房价，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没有融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逐渐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在很难融入大城市而又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的情况下，多半会将多年来个人或其父母在城里打工的积蓄用于在其父母原居地的城镇建房或买房，从而也使近年来城镇

的发展与需求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国家也因此看到城镇化在扩大内需、拉动增长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从而将其作为未来十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加以推动。

但这一过程显然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人口在城镇的聚集需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从大城市回流到城镇或者从乡村进入城镇的人口多半是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的家庭收入基本上可被分成两个部分——农业收入与打工收入。这些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选择在城镇建房或买房后，就有可能彻底断绝与农村的联系，从而也将失去农业方面的收入。他们要么在城镇就业，要么把房建在家乡城镇或在家乡城镇买房，继续到东部大城市务工。第一种情况要求城镇有相应的产业吸纳他们留在本地，而如果过多的是第二种情况，城镇也很难起到真正留住人口的作用，所谓的乡镇房地产就有可能因为空置而使乡镇沦为鬼城。

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发展乡镇房地产业，同时还要发展本地经济。而中西部乡镇很难像东部大城市那样吸引外来资本，只能依靠地方资本投资与地方产业的发展，即各地方需要利用自身的资源、文化等优势发展本地经济，从而支撑起本地的城镇化。

这也使中国的城镇化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费老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指明的小城镇发展道路上。费老在 80 年代即强调各地应依据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因地制宜，多样模式”。费老所谈到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耿车模式、民权模式等都是各地方所发展出来的区域性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各个地方社会在现代化、工业化道路上的自主性，也被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总结为内发型社会发展模式。而按照发展社会学家的观点，这种内发型发展，虽然在速度上比外向型发展慢，但由于与社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环境结合在一起，城市化会更均衡、稳妥地发展。

但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不同的是，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中国人，也有了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应对市场经济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正面来看，一批从大城市返乡的昔日的打工者有了驾驭国际市场的经验，因此能够在家乡将农产品加工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产品；而从负面来看，食品安全等问题也成为城镇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因此，国家要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是一项系统的社会进步创新工程。国家在引导与鼓励城镇兴起的同时，需要在制度创新与建设、人的发展与成长、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生态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贯彻方面花费更大的力气，才有可能使城镇化取得预期的成功。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用费孝通的理论检视这一过程时，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的实践既在很多方面超出了费孝通当年的预期，又在很多问题上不无言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过程也因此得以显现。我们对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反思，既不是为了肯定其观点、称赞其有先见之明，也不是要加以否定，说明他的发展观点已经过时或与社会实践不符，而是期待能够沿着费孝通先生“学以致用”的学术道路，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继承与超越他的思想。这也正是本书所试图呈现的逻辑。

上海大学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是在费孝通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沈关宝、李友梅等就追随费孝通先生对江村以及吴江进行追访，《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即基于他们的调查研究写成。此后，沈关宝出版了旨在反映80年代苏南地区工业化的书——《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对费孝通所提出的小城镇模式做了延伸研究。到了90年代，李友梅在法国学成归国后，受费老的鼓励赴上海浦东地区进行调查，投入对全面展开的由国际资本所推动的快速城市化的研究中。进入21世纪后，进城的农民如何适应新的社会与构建新的社区生活方式成为上海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上述研究背后始终有来自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与推动，费老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或者到达了顶点的理论。本书所展示的也正是上海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从费孝通小城镇问题出发，对不同时期城市化实践进行的回应，也是对3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与城镇化过程所做的深入和延伸研究。

本书所收录论文的编排也遵从上述逻辑。张江华、陈志勤的两篇文章虽然成文较晚，但因为是从知识史的角度梳理费孝通有关乡土与城市及城镇化思想的来源、形成与学术意义而被放在开头；沈关宝的论文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内发型发展模式下乡村工业与文化变迁的研究；李友梅的文章分析了在所谓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国际资本的输入所导致的城市化社会问题以及多方博弈的过程；沈关宝和王慧博、刘玉照和金文龙的文章探讨了村民成为市民（居民）过程中的问题与逻辑；陈志勤、刘春燕的文章则再次回到费孝通所说的内发型发展模式，前者讨论了当代一些古镇利用丰富的文化与旅游资源复兴古镇的现象，后者描述了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的可能性；最后，沈关宝、张江华和耿敬的文章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对当前城镇化的问题与前景进行了反思和展望。上述文章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组合在一起，既在总体上构成了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与城市化过程的图景，又反映了我们从费孝通小城镇理论出发，对中国城镇化问题所进行的连续

性与系统性的研究和思考。

费孝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10 年，2016 年我们也会迎来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 80 周年纪念。费孝通先生亲身经历了中国从“乡土”社会逐步向都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他的学术历程也从大瑶山、江村这类“乡土”社会起步，追随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步伐，从乡土扩展到都市、区域以及全球。费先生曾总结说他一生“但开风气不为师”，我们的上述工作，也是期待能继承费孝通先生所开的“风气”，让学术能够薪火相传。我们相信，这也是费孝通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的延续。我们能够想象：如果费老在世，身体健康，他还会或亲身或用言语激励我们“行行重行行”，寻找中国城镇发展的新模式，解决中国城镇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目 录

“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

文明社会研究 张江华 / 1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与日本的内发型发展论 陈志勤 / 24

乡村工业与文化变迁：改革开放初期的江村 沈关宝 / 47

浦东新区开发开放过程中农村向城市突变提出的问题

——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实地调查 李友梅 / 85

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 沈关宝 王慧博 / 137

集体资产分割中的多重逻辑

——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造与“村改居”实践 刘玉照 金文龙 / 145

文化选择和“地方”的再生产

——古镇保护与“泛中国文化”的建构 陈志勤 / 165

“内发型”城市社区建设：费孝通的第三种思路 刘春燕 / 184

《小城镇 大问题》与当前的城镇化发展 沈关宝 / 198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对小城镇化理论的

继承与超越 张江华 耿 敬 / 207

“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张江华*

众所周知，人类学最初的研究对象是所谓的无文字的部落（tribes）社会。这一研究缘自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全球的扩张，原来“与世隔绝”的一些社会开始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如何理解这些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简单的、野蛮的、未开化的人群以及他们的社会与文化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华勒斯坦曾总结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现代西方这类“有历史、有高度文明”的社会；而在西方之外，还存在一些虽然有文明但“历史停滞”的社会（譬如中国、印度与阿拉伯社会），这些社会被归入所谓东方学的研究范畴；另外，在二者之外，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甚至也存在于文明社会边缘的无文字社会则被收入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囊中（华勒斯坦等，1997：22~26）。因此这一学科最初也是和这些人群的发现者与统治者——传教士、探险家、殖民地官员——联系在一起，对他们的描述构成这门学科最初的基础，人类学的早期学者也因此利用这些材料建构起了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早期生活。在进入20世纪之后，以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类学家开始运用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的方法对这些社会进行精细的研究，显然，这一方法开始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对这些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理解上，人们也开始考虑它们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但人类学仍然被理解为是研究这个世界主流社会之外的剩余社会的学科。直到1923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就任英国人类学学会主席的致辞中还宣称“今后我们的社会人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任务是开展对世界

* 张江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上各个尚未开化的人群的研究”（转引自芮德菲尔德，2013：13）。

不过，这一情形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发生了改变。1939年，W. 劳埃德·华纳（W. Lloyd Warner）指出“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切类型的人类社会，既包括原始型的社会也包括开化型的社会，既包括简单型的社会也包括复杂型的社会”（转引自芮德菲尔德，2013：14）。同样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20年之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到了1944年，他开始这样描述社会人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任务：“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把整个地球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人类社会全都包括在内的。”（转引自芮德菲尔德，2013：14）1951年，埃文斯-普理查德对这一时期有关人类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做了一种较为折中、力图为多数人接受的表述：

从理论上说，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人类社会；它应该是社会学这个大领域里的一个学科，而且其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开展对类似原始人类时代的那种形态的社会的研究。我想把社会人类学的任务做这样的认定应该能为众多的人类学者们所接受。也许只有那些坚持认为即便仅仅是在研究的具体操作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偏重于对原始人类时代的那种形态的社会的研究都是不可接受的人类学者们才会对我的这种说法持有异议。（转引自芮德菲尔德，2013：14）

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说法似乎体现了一些传统人类学家对人类学“主要的任务”的坚守，但很显然，人类学理论上的研究对象应该涵括整个人类，这已成为那一时期人类学家的共识。事实上，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人类学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时期，有关马来西亚、缅甸、巴拉圭、中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以及美国等地的民族志陆续出版，尤其是一些著名人类学家也转向现代社会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最典型的研究莫过于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研究以及罗维对德国的研究。也就是说，至20世纪50年代初，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原始社会研究，而将触角伸向了古往今来的一切社会与文化。

这一风气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是这一时期两位重要的人类学家——一位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①，另一位则是来自中国的

^① 也有学者译为芮德菲尔德。

人类学家费孝通——他们二人也因此被公认为人类学史上文明社会研究的先驱与开拓者。

本文即梳理了这一转变过程，讨论了人类学学科史上这一重要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一些重要的概念与方法论的出现和应用。我们知道，与上述转变相伴随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转换，更包含理论与方法论上的推进，尤其是从研究“原始”社会发展出来的微型社区调查与分析方法需要面对既有社区之间的多样性又有社区之上的复杂结构的现代社会的挑战。我们因此也可以看到：正是他们最初的不谋而合以及之后的密切交流在理论与方法上推进了人类学有关文明社会研究的进程，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差异，也让我们了解到中西方学者在知识生产与创造方面的异同和得失。

一 人类学对“乡土社会”的发现

从时间上看，雷德斐尔德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即已作为人类学家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从事田野调查。雷德斐尔德的一生，从受教育到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1926 年，他开始在距墨西哥城不远的泰普兹特朗（Tepoztlan）村庄从事调查，并以此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1928 年完成答辩并在 1930 年出版了《泰普兹特朗，一个墨西哥村落：民俗生活研究》（*Tepoztlan, A Mexican Village: A Study of Folk Life*）一书。在此之后的 1932 年，雷德斐尔德来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地区，开始用 16 年的时间在这一地区从事田野调查与社区比较研究，1941 年出版《尤卡坦民俗文化》（*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一书。整个墨西哥村落社会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也因此成为雷德斐尔德此后构建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稍晚于雷德斐尔德，来自中国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在 1936 年完成了对中国江南地区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并在 1938 年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

费孝通的工作多少有点在意料之外。本来，费孝通也是遵循他的老师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的指导从事传统的人类学调查研究。1935 年夏，费孝通与他的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今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从事实地调查，在进入大瑶山调查约两个月时间后，他们在转换调查地点的途中，遭遇了不幸，一死一伤。1936 年夏天，费孝通来到其姐姐费达生工作的地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养伤，在那里，受过新式教育的费达生正在从事农村蚕桑推广工作，费孝通也因此对

开始起步的中国乡村工业产生了兴趣，在养伤期间顺便对该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当年10月，费孝通携带大瑶山调查与江村调查两份资料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与弗思（Raymond Firth）交谈之后，弗思建议费孝通使用江村的资料来撰写其论文，从外地归来的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也决定亲自指导费孝通的论文。两年之后，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费孝通写成了众所周知的《江村经济》，并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

也就是说，虽然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有点出自“无心插柳”，但该书的写作与完成却在情理之中，因为无论是马林诺斯基还是弗思，都已预感到人类学即将到来的这一转变。在《江村经济·序》中，马林诺斯基说他此前已预言“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因此，在他眼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开始实现他的预言。正因如此，《江村经济》被马林诺斯基评价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1997：3~5）。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其实并不意外，而由他与雷德斐尔德一起来“开风气之先”也并非偶然，因为在他们身后，我们还看到了当时两位著名的学者对他们的推动：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派的奠基人同时也是雷德斐尔德岳父的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教授，另一位则是当时的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

罗伯特·派克最初是一个关注社会问题与城市贫民问题的新闻记者，后来在德国师从J. 罗伊斯、G. 齐美尔等学习社会学，回到美国后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成为社会学界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派克教授倡导社区调查研究，即将人类学在部落调查中所使用的方法应用到都市社会的研究之中。这一研究方法对雷德斐尔德与费孝通的乡村调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雷德斐尔德是派克教授的女婿，早年试图追随父亲的步伐学习法律，但后来发现他的兴趣并不在此，因而在派克的影响下，转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学习。在派克教授的鼓励下，雷德斐尔德的田野调查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既不在人类学传统的原始部落社会，也不在都市社会，而是在都市社会边缘的乡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Wilcox，2004：4-8）。而派克教授对费孝通的影响则源自1932年应吴文藻教授邀请来华讲学，当时

费孝通作为学生，不但仔细聆听了派克的讲学，与同学杨庆堃整理派克的讲稿，还积极参与了派克在北京的教学实践。派克教授也被费孝通视为对其有终身教益的老师，直到晚年费孝通还不断提起派克对他的启示，倡导重温派克的学说并补课。显然，就方法论而言，江村调查也是费孝通对这一实地调查方法的自然的实践。

在同一时期，布朗也对雷德斐尔德和费孝通产生了影响。1931年，布朗应聘来到芝加哥大学任人类学教授，成为雷德斐尔德的同事。在这里，他培养了索尔·塔克斯（Sol Tax）、埃根（Fred Eggan）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其中塔克斯也走上了与雷德斐尔德相似的学术道路，在美洲的危地马拉从事田野调查研究，与雷德斐尔德在墨西哥的调查研究相互呼应并相互争论（Wilcox, 2004: 54, 61, 63）。而在1935年，也是应吴文藻教授邀请，布朗教授来华讲学三个月，费孝通在赴大瑶山调查之前也聆听了这位当时人类学领军人物的讲学并参与了他所组织的一些实习调查。

也就是说，雷德斐尔德与费孝通的工作背后有这一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领袖人物的支持和推动，这一推动来自该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或者说人类学的社会学取向。20世纪初，在马林诺斯基奠定了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家的基本研究手段与方法之后，人类学学科从原来更多地体现出历史学属性转向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属性，而人类学由此发展出来的微型社区调查与分析方法也得到了社会学的接纳和认同，因此，两个学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而随着这一时期文化相对主义与反对种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原始之间的区隔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人类学从理论上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原始”、“野蛮”就成了与自己的学科理念自相矛盾的悖论。事实上，对这一转变的缘由，费孝通本人表述得非常清楚：

对小农社区的分析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发展。起先，人类学的领域局限在所谓的“原始共同体”内。但是，当野蛮和文明之间的界限，即一个为了证明白人的特殊责任而想出来的理由，在一个世界性社区的演化过程中日益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一些以社会学原则工作的人类学家开始拒绝接受19世纪惯例的束缚，并试图获得研究各种类型的人类社区的权利。在上100年里，他们很幸运地发展出一种社区分析的技术，这一技术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方法。从研究较为封闭、整合得较好的所谓的“原始”人的社区开始，